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作品

经济学家林毅夫 钱颖一 巴曙松倾情推荐

MASS
FLOURISHING

大繁荣

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

[美] 埃德蒙·费尔普斯 著
(Edmund Phelps)

余注 译

罗伯特·席勒
(Robert J. Shiller)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如果包含《大繁荣》一书的内容，
可以成为一部更伟大的作品。

How Grassroots Innovation
Created Jobs,
Challenge, and Change

中信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繁荣 / (美) 埃德蒙·费尔普斯著; 余江译. --
2 版.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10

书名原文: Mass Flourishing: How Grassroots
Innovation Created Jobs, Challenge, and Change
ISBN 978-7-5086-9402-3

I. ①大… II. ①埃… ②余… III. ①世界经济-经
济发展-研究 IV. ① F1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98448 号

Mass Flourishing: How Grassroots Innovation Created Jobs, Challenge, and Change
Copyright © 2013 by Edmund S. Phelp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大繁荣

著 者: [美] 埃德蒙·费尔普斯

译 者: 余 江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2 版

京权图字: 01-2013-4978

书 号: ISBN 978-7-5086-9402-3

定 价: 79.00 元

印 张: 29.75 字 数: 356 千字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推荐序一

关于创新的思考

现代经济增长是一个经济体中技术和产业不断创新的结果，这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无不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处于全球的前沿，创新只能来自自己的发明。发展中国家则位于世界技术和产业链的内部，创新可以依靠引进和模仿来实现，而使风险和创新的成本远低于发达国家。这种可能性如果利用得好，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可以数倍于发达国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飞速增长相当大的程度上正是依靠这种技术和产业创新的后发优势。随着经济的增长，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和收入差距不断缩小，我国最终也要走上和发达国家同样的创新道路。如何未雨绸缪、做好准备以迎接创新方式转变时代的到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所必须提前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大繁荣》一书中，埃德蒙·费尔普斯教授深入探讨了自工业革命以后、现代经济增长出现以来，先后领跑世界经济增长和创新的英国和美国的创新动力源泉和激发这种动力的制度环境，提出了许多不同于当前学术

界普遍接受的见解，很值得我们在思考中国未来变革问题时深思和参考。

林毅夫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世界银行原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推荐序二

与费尔普斯同行

《大繁荣》是费尔普斯教授大智慧的结晶。在这本书中我们读到了他超越经济学的思考，读到了他的历史厚重感、哲学思辨性、社会责任心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刻分析。我有幸与费尔普斯教授共事三年多，与他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美国、瑞士走了很多地方，开了很多会议，留下许多美好回忆，更重要的是，与他在思想上的同行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活力和创新是本书的主题，也是这几年来我不断从费尔普斯教授口里听到的关键词。我们在一起探讨了活力与社会体制、经济制度、国家文化、全球市场之间的关系，活力与创新的概念、活力与创新的逻辑关系、活力的量化检测方法等等。根据费尔普斯教授的解释，中国处于最有活力的发展阶段，绝不亚于 19 世纪 20 年代的英国和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费尔普斯教授 30 岁时见证了美国的活力，他 80 岁时有机会见证中国的活力，于人生而言，这当然是很有意思的。

我还和费尔普斯教授一起探讨了国家中长期创新能力的定量

化评价。在目前各种关于国家创新能力的排行榜上，很多小国家名列前茅，例如瑞士经常位居第一，因为很多指标是用人均数据表示的。我们在瑞士看到他们标榜本国人均诺贝尔奖世界第一。但是，对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的量化评价，什么用总量、什么用均值、什么用比重，什么用因、什么用果，一个国家是否参与前沿科技（如航天、核能）是需要更加理性设计的。更何况这些评价指标解释不了一个国家的中长期创新能力。例如，与制度性因素和文化性因素的关系。

《大繁荣》是费尔普斯教授的力作，但是肯定不会是他最后一本书。他体壮如牛、思维敏捷，仍然承担着一个大学教师的标准工作量并游走于世界各地，观察、思考、促进着世界的大繁荣。马上我们就要庆贺他的八十岁生日，孔子说过“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没有说八十岁如何，因此我也不知道如何用中文祝福他，只好用英文干巴巴地说，Ned, happy birthday to you! 另外我还要说，下一部力作最好还是在你生日前出版，那时，一个具有中国内涵的世界一流商学院的全体教师和学生将共同祝贺你生日快乐。当然，也别写得太快，给我们多留一些时间。

何志毅

新华都商学院教授
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2013年8月

推荐序三

读懂美国十年经济病症

费老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享誉世界的大经济学家，邀请我这个忘年之交为他的新书《大繁荣》写序，压力很大！

我花了整整四天，躲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旁边的酒店里，通读《大繁荣》这本经济学的鸿篇巨制，大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之感，开窍解惑，醍醐灌顶。费老把激情和理性、科学和艺术、哲学和经济学、理想和现实、历史和未来、推理和实证完美地结合在书中，没有见过经济学著作还可以这样写的，我已经好些年没有读到过这样的好书了。就像读大哲学家卢梭深奥哲学的同时获得文学艺术的享受一样，读大经济学家费尔普斯透彻经济学的同时获得妙笔生花的陶醉。

《大繁荣》是费老对美国 and 整个西方过去数十年经济病症的诊断书和整治方案。他以悬壶济世之心、华佗扁鹊之术，望闻问切，把脉下药。读懂了《大繁荣》，就不仅读懂了西方经济文化和经济制度，而且读懂了西方经济史；不仅读懂了资本主义，而且读懂了社会主义和社团主义。书中深刻的分析和海量的文献让我有读君一

本书、胜读百本书的收获。

费老把繁荣定义为生活的兴盛，即对事业的投入、迎接挑战、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把国家的繁荣定义为大众的兴盛，它源自民众对创新过程的普遍参与，它涉及新工艺和新产品的构思、开发与普及，是深入草根阶层的自主创新；把具有创新活力（即具有开展自主创新的欲望和能力，尤其具有激发和包容草根阶层自主创新能力）的经济称为“现代经济”，并强调现代经济并不表示目前的经济。他以理论逻辑、历史验证和数据实证阐明了现代经济能够达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实现美好生活，符合公平正义。而现代经济带来的一定风险和不确定性则是追求美好生活必要的成本。

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社团主义和社会主义三种经济发展模式在西方乃至全世界的实践进行了深入的横向比较分析、纵向历史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只有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符合现代经济的本质要求。

他明确指出，从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到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繁荣的历史进程是广泛出现的自主创新的结果，是现代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西方经济和美国经济衰败的历史过程是放弃正确的现代价值观和经济文化，对社团主义侵蚀现代经济和政治制度一退再退的结果。要使美国经济和西方经济重振雄风，唯有再度拥抱现代价值观和现代经济文化，清除社团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对现代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腐蚀。

虽然《大繁荣》探讨的是对美国 and 西方经济病症的全面诊治，但对诊治中国的经济病症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2011年9月，在费老邀请我参加的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经济学术会议上，我发表的论

文《中国模式的悖论》就是与费老的讨论、切磋和启发下写成的，此文在会议上引起强烈反响，验证了这种借鉴意义。

王建国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第二版序

我对中国人怀有极大的尊敬与热爱之情，因此看到《大繁荣》一书第一版面市以来能得到中国决策者、专业学者及其他人士的认可，备感欣喜。如今我再次满怀喜悦之情，因为本书即将推出新版，而且恰逢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本书讲述了西方世界如何实现持续经济增长与个人发展并举——西方国家锐意改革，也许只有这样才能重获过去几十年间失却的一切——也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提供了经验教训。在我看来，中国和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正在经历着相同的学习过程。

长久以来，人们都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与发展需要持续的“创新”。没有“创新”，资本投资将会遭遇收益递减，经济增长与发展便会减速甚至归零。还有，创新需要“创新者”。但这两个术语在经济学家眼中究竟该如何理解呢？

“创新”不是发现或发明。这一术语是指那些被采用的新产品或新方法——开发者将其用在生产中，或者出售给他人，他们将其用于自己的生产或消费。“创新者”这一术语指的是实现创新的个

人或团队。

事实上，创新机制一直在发展，可人们对它的了解却始终是滞后的。当下“创新者”这一术语有了更广泛的定义。

在 20 世纪早期，德国历史学派的几位学者——斯庇索夫、熊彼特和卡斯尔——认为创新源于“科学家和航海家”的发现。在他们眼中，一个国家只需要商人的“热忱”来发展“显而易见的”商业应用，建造工厂来满足人们对新产品的期望需求即可。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指出，“创新者即企业家”，他们迟早会设计和运行某种发现的商业应用。当然，创新从来不是一种新的发现或发明。但对德国学派来说，创新始终来源于某种发现或发明——通常是最新发现或发明。这一论点有些价值，但太过狭隘。

本书一以贯之的原则便是，始终相信在那些历史上最富创新精神的国家，创新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商界人士的新理念。他们既包括受雇于企业的普通人，也包括商界的杰出人士，前者在其工作中会灵机一动想到更好的生产方式或更好的产品，后者会构想和评估一家新企业，以生产一些与众不同的新产品。

伴随着现有产品生产和新产品开发的创新性发展，一座城市甚或一个国家都会因此而生机勃勃。不妨想想 19 世纪 50 年代的伦敦、19 世纪 90 年代的柏林、20 世纪 20 年代的巴黎、20 世纪 30 年代的洛杉矶以及 20 世纪 50 年代的纽约。一个城市出现的创新，其中很大一部分其实是这个城市的本土创新。

在当今时代，尽管越来越多的创新举措日益国际化或全球化，谈及一个国家的本土创新以及从其他国家舶来的或“复制来的”创新，都会包含两个或多个国家的贡献者之间的协作。

改革开放之后，虽然近 10 年内在某种情况下本土创新异军突

起，但中国的创新无疑主要是舶来的。不过，因为中国可接受成本之下的外来创新复制已然穷尽，其重心正向本土创新倾斜。

毫无疑问的是，由马云这样的先驱引领的杰出创新，为中国前行道路点亮了一盏明灯。我真心希望，《大繁荣》一书中那些民众，即那些受雇于各大公司的员工和开创新公司的人，他们的愿景能够让中国政府付出卓越努力，鼓励本土怀有全新商业理念的创业公司开疆拓土，实干创新。

当然，数以百万计的创业公司不会全部转化为创新的驱动力。于是问题便来了：中国是否会有足够多的人想尝试创新？

首先，人们可能会因不愿承担失败的风险而退缩。过去 10 年间，许多中国问题观察家一直都秉持着一种相当广泛的共识——并没有那么多中国人拥有强大的内心，能够勇敢面对尝试独特创新的做法带来的风险，而尝试创新的诸多项目绕不开的不确定性也很重要。另一方面，至少在一些欧洲国家，与失败紧密相连的还有社会耻辱感，可能这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也是不利条件。最后，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的许多创新，都是由那些勇敢探索未知世界并能享受其中紧张与刺激的人实现的。中国有多少拥有如此渴望的人，目前还未可知。

然而，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精英正在勇敢探索未知世界：或创立新公司，或埋头工作在实验室成为所属学科研究的领军人物，或开启一段新的职业生涯。在过去 40 年间，中国一直令世界刮目相看，即使再次惊艳世界，也不足为奇。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逐渐意识到，只有创新才能在全球经济中占据（并保持）领头羊的位置。一些企业——尤其是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已经有了突破，它们为数字时代提供基

基础设施，推动创新活动，工业近几年也进入了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时代。

已故杰出的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先生曾欣然指出，知名公司的领导者参与一个或多个尝试创新的项目，并非追求刺激或期待利益，而是为了自保：如果他们不参与此类项目，后起者便会参与，而后便会把这些知名公司挤出市场。然而迄今为止，我觉得在中国完全没有必要担心过度创新问题（按照同样的逻辑，过度投资问题也没必要担心）。

近几年来，中国政府积极推进商业领域的创业和创新进程。这一重要举动极大缩短了创立新公司的过程，新增企业数量大大增加，它们也成了创新创业的源头活水。（已公布数据显示，在过去3年中，每天有约1.4万家新公司注册成立。）

此外，中国政府近几年也意识到在创新和创业中允许经济竞争的重要性。应当允许个人自由创建新公司，允许已有的公司自由涉足新行业。竞争是极其重要的解决办法，可摧毁和清除那些无力回天、毫无生气可言的企业。

在现代经济中，几乎每个行业的运作都面临着许多未知情况，考虑某个问题的企业数量越多，一个行业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性就越大。或者说行业外的某家公司真正了解的问题，行业内的许多公司都不见得了解。当行外人（有些有一技之长）能够自由进入某一行业时，社会便会获益——价格更低，也许还有更多就业机会。或者，一个人由于其独特的经历会对有些事有所了解，却又不可能将这些知识传达给那些用得上这些却又缺乏这类经历的人——这就是所谓的“个人知识”。

于是中国人开悟了：他们知道，如果拥有独特思维方式和知识

架构的多家公司可以自由竞争，国家便会受益。

而西方国家并没有明白这一点。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大部分国家一直认为自己有责任为知名企业提供各种保护措施，以使其免受新公司的竞争威胁，包括那些进行调整或创新的公司。这样的保护措施自然会使许多企业家备受打击，没有勇气再怀着更棒的新理念创立新公司、进军新行业了。

历史的证据俯拾皆是。战后的英国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许多产业都由英国工业联合会内部的特权社团操控，他们禁止新来者进入。当时的全要素生产率停滞不前。1979 年当选首相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制止了联合会的反竞争行为。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英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才再次出现增长。

在今日中国，我们正在见证类似的结果。中国 2016 年开始推行多项新改革，在此之前，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已连续多年减缓。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开始上升，时间会证明这一增长是否能达到令人满意的速度。

但是，心思缜密的人总会有疑问和担忧。在中国乃至西方，大量创新都集中在制造生产资料和建设基础设施或者开采自然资源（即所谓资本）的产业中，而在服装制造、住房供给、养老服务和娱乐活动等行业（即所谓消费）中，几乎没有什么创新可言。人们自然会问，这样过于专注的创新是否能走很远呢？实际上，美国方面的数据显示，生产资料的价格指数几十年来一直在稳步走低。这表明，志在从该方向突破创新的中国企业最终不会有任何出路。简而言之，经济体必须要实现广义的创新，否则最终将遭遇危机。

西方还有另一个担忧，由这种专注的创新创造出来的新技术通过在生产资料行业扩大产能，也会拉低这些行业的工资水平。这一

现象已经使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部分地区失业率居高不下。如果中国的创新也是如此专注，那未来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在我看来，一种健康的经济也许能够调整这种不平衡。受到影响的那些产业工资水平下降，也会减缓其他产业的工资增长速度——直到工资水平恢复到以前的平衡状态。这种减缓将会成为一股力量，逐渐推高后起产业的投资回报率。其结果将是投资再掀高潮，最终带来薪资上涨和就业率回升。其他治愈机制也许也在发挥作用，但这很可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调整过程。

随着 19 世纪 90 年代欧洲社团主义的兴起，人们对创新又有了其他担忧。（20 世纪 20 年代，普鲁士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在德国的地位举足轻重。）一种担忧认为，创新是一名无头骑士，总是朝着未知的方向横冲乱撞。当时的社团主义者就像现在一样，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重大失败。我的回应是，经济的走向不见得有多么重要，只要经济参与者——员工和老板，投资者和放款者——觉得参与创新过程是一次值得的经历，觉得由此产生的生产力提高对于满足人们需求也是有价值的，就够了。

然而另外一种担忧认为，经济中取得的创新很可能会引导经济发展，但发展方向并非社会想要的。中国领导人曾经讲到“高质量发展”，其他人则提到解决不平等问题，还有人谈到生活质量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应当更关注工作经验问题。

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这一观点。谈及工作经验，许多人，尤其是在欧洲大陆的人，认为最优配置（必须是运转良好的机构）加上教育投资，就一切齐备。毕竟，意大利人、德国人和法国人认真苦干的时间相对较短，每小时的生产力和工资却相对较高，比在美国和英国高。

然而，欧洲大陆的人似乎对自己的工作不太满意。他们对超长假期以及相对较低的劳动力参与度的偏爱便是间接证据。关于工作满意度的调查则提供了直接证据：在西方大国中，欧洲大陆的工人对其工作的满意度最低。

这一点不足为奇。欧洲的公司多半已不再是充满新刺激和新挑战、令员工心向往之的地方了。但是，如果中国要避免这种一味追求效率的欧洲模式，又该采取哪种模式呢？

在这本书中，我提出恰当的模式就是美好经济，即能提供美好生活的经济。它究竟是什么呢？它不仅是高生产效率，也是商品生产和消费的完美融合。不过这还远非美好经济的充分条件。

我不大赞同有些经济学家说美好生活的标准就是生活质量。让-保罗·菲图西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描述的愿景，即充分的休闲和肆意消费，特别是对于公共产品的享受，包括市政设施，如城市公园、体育场馆、干净的街道。它是一种可追溯至古代的理想的具体版本。

当然，我不反对这些服务，也不反对国家提供这些服务，但它们并不等于哲学家关于美好生活的构想。（亚里士多德曾开玩笑说，我们需要这些服务来恢复气力，为第二天的工作做准备。）

哲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指出，经济学家对消费的关注忽略了人们对“做事”的需求。但他说得还不够到位，人们其实总想跳出自己没有自主权的工作规划。

我的观点是，为了美好生活，人们在工作中需要一定程度的帮助。他们希望能够积极主动，做一些有吸引力的工作。人们重视能够表达自己的空间——说出自己的想法，展现自己的才华。

换句话说，人们重视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的成就。我曾经用